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FOREIG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24

12550.2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十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丁如筠

责任校对：金 光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丹丹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二十四辑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004-1452-8/K·219 定价：9.50元

目 录

• 专题论文 •

上海的英国会馆(1843—1854).....张琳德 (1)

王 硕译

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A. J. 艾玛 (24)

田 君译 江德钧校

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田宏懋 (66)

朱 华译

通往权力之路：盛世才在新疆的最初几年(1930—1934)

.....陈福霖 (82)

王 静译

大毛根与江南造船所(1905—1927)——中外合作一例

..... Ch. 科尔耐 (120)

黄庆华译

广东工人运动的各种思潮——广东省总工会成立经过

..... 广田宽治 (133)

吴 仁译 王玉平校

• 书刊评介 •

《19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前言..... P. 罗伯茨 (162)

曾学白译

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民：义和团起事的背景

——评周锡瑞著《义和团起事之源流》.....刘广京 (176)

宋锦洲译 陈德元校

0597/15

托马斯·罗斯基著《抗日战争前中国经济的发展》

.....塚瀬 进 (188)

王玉平译

蒋介石的第二个妻子陈洁如的神秘手稿.....易劳逸 (195)

严向东译

柯博文著《面对日本：1931—1937年中国的政治与日本

帝国主义》.....万 燕译 (208)

介绍两部有关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方面的著作

.....万 燕 (210)

• 学术动态 •

美国辛亥革命研究简介(1979—1992).....樊书华 (214)

近30年来美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军阀”的研究.....塚本元 (232)

陈 明译

1990与1991年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饭岛 涉 茂木敏夫 (255)

张永江编译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简介.....孙準植 (276)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九).....黄光域辑 (290)

上海的英国会馆

(1843—1854)

张琳德*

上海市的发展无疑是从1843年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但是，多数人的观点与本文不同，他们认为，在此之前上海不过是个小渔村。就连一些研究上海早期历史的学者也只将它描述成中华帝国版图上的一个边远小镇。^①用19世纪60年代欧洲观察家的话说，上海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三流城市”。^②

然而，英国人在1842年订立的《南京条约》中将上海选作中国第一批沿海通商口岸之一却是千真万确的，这说明当时上海的地位并非无足轻重。其实，除了香港，也许还有新加坡，多数后来变成重要的殖民地前哨的城市在被欧洲人占领时还没有形成，但 these 城市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商业中心。上海也如此，只是在西方的报道中还未得到普遍的承认。

人们对上海的发展的学术考察，大多集中在1843年以后该城

* 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专长为清代社会文化史。本文为张教授近作“Shanghai from Market-to n to Treaty Port, 1274—1858”中之一章，该书将在本年度出版。

① 18世纪江苏巡抚张楷在上疏中强调，上海是边防沿海地区，请求皇帝在此设海关道，并指出“上海远在海隅，更为宵小出没之地，盗案最多，若委该道经理关务，移驻上海，不但关税得有专责，并可巡查奸匪，似于地方更有裨益。”见《上海县志》(同治)，卷2。

② 梅辉立(W. F. Mayers)、德尼克(N. B. Dennys)合编《中日商埠志》(香港，1867年)，第330页。

市的历史上。^①最近，在社会经济史方面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19世纪上海的重要专题文章。^②但上海早期历史及其在《南京条约》前已是大港口这一事实却被忽视了(至少英文著述中是这样)。^③上海作为棉花生产中心和一个日益兴起的港口的历史表明，清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日趋商业化，并间接地反映了国际市场对它的影响。正如本文所要说明的，1842年以前上海不仅是个重要的商业城市，而且其官员们也富有经商经验，并善于管理他们的机构。1843年，少数外国人的到来只给这个城市及其商业机构带来很小的变化。

上海开始引起人们注意是在宋代，当时它还是一个乡镇；宋、元时期繁荣兴旺，成为海岸港口；南宋时是官方确定的“集镇”；1294年元代依据行政区划新设上海县。^④早在1277年(一说是1298年)，负责监督管理外贸事宜的市舶司——管理商人、征收关税的衙门——在上海成立，此时人们已认识到上海作为港口和贸易中心的重要性。^⑤明代的上海经历了商业衰落阶段，至清康熙解除海禁时又有所复苏。18世纪中叶，海关从松江移至上海，上海

① 有关的两部专著是：墨菲(Rhoads Murphey)的《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Betty Peh-T'i Wei 的《上海——近代中国的熔炉》(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见施坚雅(C. William Skinner)主编《晚清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中伊懋可(Mark Elvin)的《市镇和航道——1480至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又见伊懋可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中琼斯(Susan Mann Jones)的《上海的宁波帮及金融势力》一文及伊懋可的《1905至1914年上海的行政管理》一文。

③ 上海的前身是青龙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邹逸麟的《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青龙镇》。专门探讨鸦片战争前上海历史的论著有：张忠民的《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杜黎的《鸦片战争前上海行会性质之嬗变》。

④ 《上海县志》(同治)，卷1。

⑤ 见邹逸麟、张忠民前引著作。18世纪的《沪城备考》“序”中，元代的上海图上标有市舶司所在地。日本斯波义信在《宋代的贸易交往》一文中指出：南宋时此项税收常包给掇客和商人。

遂成为江苏唯一的外贸关税征收站。^①乾隆年间(1736—1796)上海再次成为主要港口。在19世纪开放的几十年中,上海不断兴旺发达,大批商人从全国各地纷纷来到此地建立同乡会馆。与此同时,本地商人也成立了同行公所。至1830年,上海的会馆(外地人建)和公所(本地人建)大约26个,会员达数千人。^②有学者估计,到1840年,上海已算得上中国20个大城镇之一。^③以上就是上海开放前的情况。

虽然《南京条约》是在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但直到1843年11月8日,第一个英国代表团才搭乘一艘名叫“摩底士底”(Meditusa)的小艇来到上海。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对其来华目的表示怀疑,并对他们怀有敌意。英国代表团由新任领事、34岁的英国军官巴尔富(George Balfour, 1809—1894)上校、担任口译的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及作为翻译随团来华的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Sir W. H. Medhurst)、军医和书记员黑尔(Frederick Hale),以及职员——“唯一的商人”斯特罗恩(A. F. Strachan)组成。副领事罗伯逊(D. B. Robertson)随后也到了上海。当晚,这伙人痛饮美酒,为一个即将对英国开放的、曾是偏僻而无足轻重的小城光辉而伟大的未来干杯。翌日晨,他们上岸向上海道台作了自我介绍。^④

接待他们的是新任苏松太道官慕久和松江府同知沈炳垣、蓝蔚雯及其他地方官。^⑤他们对外国人的接待既得体又谨慎。次日,

① 《上海县志》(同治),卷2。

② 行会一览表,见《上海县志》(同治),卷3。此数字又根据杜黎和张忠民著作中的材料作了补充。

③ 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地区都市化》(见施坚雅编《晚清城市》,第248页。)

④ 麦都思:《上海开埠记》,见《中日丛报》(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卷2,第15期(1864年),第80页及蓝宁、库寿龄(Lanning and Couling):《上海志》,卷1(1921年,上海)第274—277页。

⑤ 有关活动经过的中文史料,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有关补充报道,见费正清(J. K. Fairbank)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94页。又见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变革中社会之连系人物》(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中方礼节性回访了英国领事，并参观了“摩底士底”号。^① 尽管这些中国官员在英国人进入上海时上任还不到一年半时间，但他们对督办夷务的耆英所制订的以“制夷”为核心的方针却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在与这个“夷蛮”代表团接触时自然就非常谨慎。

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拟定了有关上海开埠的奏折。他们由于品第太高，没有参加和英国人的谈判，但始终呆在宝山附近密切注视太道宫慕久及其同僚。奏折描述了巴尔富等人乘汽艇登陆的情景，并且提到了作为英国官方代表的巴尔富受璞鼎查(Pottinger)指派负责上海市场的正式开放事宜。用官方语言说，他的行为是“顺从而殷勤”的。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43年11月9日)，巴尔富在道台衙门受到接见并出席了在海关为他举行的宴会。次日，中国官员依照外交礼节回访了他。英国人显得“十分顺从，甚至有点胆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9天后，即九月二十六日(1843年11月18日)，上海港正式宣布开放通商。^② 这份奏折中谨慎的措词可以反映出一些官员非常关心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否恰如其分、是否遵守所有规章制度。早先的官员们办事不谨慎因而吃了苦头。^③ 因此，谨小慎微就成为与“英夷”交往的权宜之计。^④

至于上海民众，他们对英国人沿长江逆流而上导致在南京签订投降条约期间，外国船只向上海的防御工事开火，外国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的情景记忆犹新。上海官民的心态十分复杂，这不

① 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指出：此次回访未见于官方记载。清廷对“英国人十分顺从，甚至有点胆怯”和巴尔富恰如其分的谦逊感到十分得意。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

③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两艘英国船曾视察上海，其中一艘在1843年3月，另一艘在5月，它们都在限期内离开了。但前任道台颜以燠对此视察所作的含糊其辞的奏报却导致他被免职。见施维许(Earl Swisher)：《中国对美夷的处理》(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20页。

④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使用“夷”字是对他们的蔑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见费正清编《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32页。

仅因为官方的谨慎，还因为有着对英国占领时清朝地方官弃上海而不顾，使它面对蛮夷的威胁毫无抵抗力的那种难堪局面的记忆。^①

英国决定在中国增设通商口岸之前，就已同中国有了一百多年的贸易往来。至鸦片战争时(1840—1842)达到了顶点。^② 1685年康熙废除海禁就意味着招徕洋人经商。广州、泉州、宁波和松江(后在苏州)等地海关的建立表明，将这些市镇作为南方沿海主要港口能够增进与外商的合法贸易。17世纪末叶，荷兰和英国的商船开始调查中国沿海情况。随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人就活跃在中国的沿海了。

江苏海关——以大关知名——从内陆松江府迁到了苏州，又于1731年迁至上海，给长江流域的国内贸易和沿海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1684—1759年间，上海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山东、辽东及朝鲜等北方外洋航线和南方航线的沿海港口，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南洋。^③ 在此期间，很少有欧洲商船知道上海的存在。因此，当1760年乾隆皇帝颁布诏书限制对欧洲的通商贸易只开广州、对俄只开恰克图时，上海几乎未受到不利影响。

在整个18世纪，由于英国国内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英国人对与中国贸易越发感兴趣。^④ 至1820年，广州的贸易已被东印

① 曹晟在《夷患备尝记》中记载了一位目击者对英军入侵上海的报道。“夷”这个词只用于书的标题，在文章中并未出现，而是代以“洋人”、“洋兵”和“英人”、“英兵”等字眼。因此，标题中这个含蔑视意的“夷”字可能是1876年该书出版时加上去的。

② 关于鸦片战争的报道，见A. 韦利(Ar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8年)、J. 比钦(Jack Beeching)：《中国鸦片战争》(纽约，1975年)、格林伯格(Greenberg)：《1800—1842年英国的贸易和中国的开放》、P. W. 费伊(Peter Ward Fay)：《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纽约，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广州的贸易与鸦片战争》，载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63—212页。

③ 关于1840年前中国商业情况，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

④ 关于茶叶和鸦片贸易的概况，见格林伯格：《英国的贸易和中国的开放》。

度公司和许多从事鸦片贸易“国家”的商人所垄断。^①由于茶叶进口税很高，又由于非法的鸦片贸易很快变成了一种危险的行当，这些英国商人的盈利越来越不稳定。1833年，议会的一项早期法令使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垄断地位，商人们的处境也更加动荡。于是，他们便加入到没有约束力的竞争中去，把更多的鸦片推向非法市场。中国这个在19世纪的几十年开放中茶叶、丝绸、瓷器和棉花出口贸易持续顺差的国家，眼睁睁地看着鸦片改变了一切。1826—1838年间，2600万查理金币的贸易顺差几乎全被鸦片带来的3800万赤字所抵销。^②

当时上海商人行会不顾禁止与欧洲人直接贸易的法令，越来越多地从事向西方向接输出棉纺织品的贸易。上海松江地区产“土布”已成为出口商品中重要一项，以至1833年广州市场萎缩时，上海出现了严重的萧条。^③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与广州的贸易因英国人的封锁而停止，衰退中的上海市场更加萧条。1842年夏，上海一度被英军占领，英国人在城隍庙这个市区唯一宽旷之处建起了指挥部，驻扎数日。当时，这些外国人似乎是一群快乐的观光客，而当地居民记忆中留下的却是恐怖的经历。^④

① 魏斐德：《广州的贸易与鸦片战争》。

② 行会的主要负担是鸦片，但部分赤字也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棉纺织品出口量减少造成的。在此之前，“土布”每年能带来几十万两白银的收入。见魏斐德：《广州的贸易与鸦片战争》，第173页。

③ 松江府“土布”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广州贸易中销往英美的主要商品。仅1816年一年就售出300多万匹，贸易额达到顶峰，此后因受到英美机织低价棉布的竞争而削减，至1835年完全停止。见全汉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社科版），1958年，第9期。结果导致上海萧条，其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在贸易上完全依赖棉纺，并且大量卷入“土布”交易的城市。

④ 关于英国人占领上海的报道，见《中日丛报》卷2第18期（1865年1月2日）“水师提督巴加的报告”。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见前引曹晟：《夷患备尝记》。中国人没有立刻放弃上海，“尽管中方军队在提督陈化成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抵抗，最终还是被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英军打败，全军覆没”。见前引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变革中社会之连系人物》，第41—42页。

1842年上海被占前，只有少数欧洲人到过那里。因此，英国人对上海的垂涎，是因为他们听了中国商人的介绍和一些访问过这个封闭城市的人的报道。其中有些是不太准确的。这些人中有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和1832年乘“阿美士德”号登陆的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当时地方当局原本不想理睬他们的来访，但他们却以夷蛮之邦特有的魄力闯入道台衙门，要求接见。结果道台只能礼貌地以茶待客。^①胡夏米在报告中把上海描述成一个重要港口，“七天中就有400多艘装载豌豆和面粉的船只从北方过吴淞进上海，(同时)从南方驶来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只”。^②他发现英国人已经让纺织品在上海上市，鸦片也很有市场。上海的这种贸易潜力给英国商人以深刻印象，胡夏米对此也欣喜不已，并称赞上海是“……扬子江畔的海港、东亚的重要贸易中心”。^③

1834年，语言学家麦都思神父在商人史蒂文斯(Stevens)的陪同下乘船离开休伦湖(内皮尔教会的一个教区)到上海。后来他们都乐观地报道说，上海不仅在贸易上有潜力，而且还有大量灵魂期待皈依上帝，上海港“桅杆林立，广州一地船舶的数量只有上海的一半”。^④

① 见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66—67页)中关于“阿美士德”号的访问及鸦片问题的讨论。当时的道台是嘉庆二十五年翰林吴其泰。据梁元生估计，开始他(道台)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但不久就变得温和，把对英国人的称呼从轻蔑的“夷”变为“英国商人”，还违背当时的政策允许这只英国船在上海停留18天进行非正式的商业活动。至于这些活动的范围及接待的性质，他也很可能欺骗了江苏巡抚林则徐。(见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变革中社会之连系人物》，第40—41页。

② 《中国丛报》，卷4(1834年)第549—552页。

③ 梁元生前引著作，第9页，引自《英国议会文件集：中国》，卷39，第142—332页。

④ 《中国丛报》，卷4(1834年)第329页。

1843年的《香港登录册》(Hong Kong Register)对那些没有传教士的地方作了详尽描述，尽管不太准确，英国人对这些地方的印象就是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船只也可驶入黄浦江，靠上海停泊。上海有五、六英里长的围墙，但墙上

英国商人和政府官员们根据这些报告认为，只有开放沿海港口，欧洲贸易才能挣脱广州的束缚，以便获得正待收获的无限利润。上海虽然具有自身的商业潜力，但它被选中的主要原因却在于它的战略地位：靠近长江口，为接近内地市场和至少15000万人口提供了方便。^①更重要的在于上海还是管理长江口所有进出口货物的中国海关所在地。^②最后作出决定性选择的大概是后来开办怡和洋行的查顿(William Jardine)医生和战争爆发前就已退休回国并在1841年成为议员的马地臣(Matheson)。查顿曾建议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 Palmerston)签订一个允许同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北方港口进行贸易的条约。^③

与此相适应，《南京条约》确立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中华帝国的睦邻友好、相互保护关系，并注明英国公民可不受任何干扰与限制地在条约规定的5个开放口岸居住和经商。正如中国官员所说的那样，广州为头，上海为尾。^④条约还规定，领事可在各开放口岸居住，以便管理商务、保持与中国官方的联系。中国政府应得的税收及其它权益被所谓英国公民正式取代，他们要确定“公正而固定的进出口税率及其它款项”，并“作为普通情报

没有堡垒、工事或沟渠。离城不远的一些郊区的建筑上修建了完备的防御设施。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店，上海至少可容纳30万人。”作者继续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上海港的贸易：“它确是被中国人看作天堂的苏州的港口。”来上海的航路有三条：长江及其众多支流的内陆航线和南、北沿海航线。每年有1600—1800只船在此停泊，吞吐量约30万吨。除中国船外，还有来自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波斯湾和印度洋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船只，它们都带着各种各样的货物靠港，其中包括许多诸如棉布和鸦片这样的欧洲货物。(见《中国丛报》卷15引用的1843年的报道。)

① 上海开埠数年后，英国议会会对中国的贸易潜力作了一次调查。前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尔富(1843—1846)1847年回伦敦休假，对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解释是，上海被选中的原因正是它的贸易潜力。他没有夸耀上海本身如何重要，而是着重强调它靠近苏州，是中国内地的通道。他还指出：上海注定要变成中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主要基础是开埠后其内部对英国货的需求。见《英国议会文件集》，卷38，第329、225页。

② 《上海县志》(同治)，卷2。

③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82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台湾版，卷70)。

予以公布”。^①

让我们回到1843年11月那个寒冷、灰暗的日子，也就是第一批英国先遣团到达上海的那天。当时上海已挤满迅速膨胀的本地人口和大量被该地贸易的诱惑力所吸引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寄居者，其中有许多广州人。那年年底去过上海的福钧（Robert Fortune）这样描写道：城里的房屋“星罗棋布”，而郊区，尤其是靠江那边却“非常辽阔”，有很多狭长的街道。^②

会见英国领事的中国代表只是戒备森严的前锋，一直对英国人的到来非常担心的两江总督璧昌（蒙族）、江苏巡抚孙善宝（若要他出面，他随时准备来上海），以及徘徊幕后的耆英的代理人咸龄都没有露面。经研究，决定由具有举人身份的四品官宫太道作为中方最高代表接见英国领事。^③ 中国人认为领事级别较低，只是夷商头目，并非政府官员。^④ 由道台出面接见他也许是官僚等级制中的一个失误。但按清朝律例，道台是直接主管商务的人，监督外商是其分内之事。外商们当时临时住在岸边，所以外交互访后的第一桩商务就是巴尔富领事在“十分顺从，甚至有点胆怯”（奏折原话）情况下提出关于拥有一块地盘供商人建立自己的会馆的要求。结果，宫太道选择了一块“荒地”给他们建屋造馆、设立商行。此外，由于商人们携带外币，还需建立一个融资机构。^⑤

英国人的报告虽未提及会馆的地点问题，但却记述了领事关

① 梅辉立等编《中日商埠志》，第1—2页。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提到：“每个英国领事在建馆时的首要任务都是在管辖区内悬挂英国国旗以维护英国的威望。”

② 福钧：《华北诸省漫游记》（伦敦，1847年），第108—110页。

③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梁元生在《上海道台研究》中指出：就九品官制而言，道台是正四品，知府、同知为正五品，但象上海地区这种二流同知——海防同知却是正六品，知县为正七品。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湾版，卷70。

⑤ 麦都思：《上海开埠记》、巴尔富：《1843年上海开埠记》，载《中日丛报》（1865年1月），第32页。

于在城里寻找住处的坚决要求。当英方提出需要一所房子供居住与经商之用时，遭到了中方的拒绝，理由是上海房屋已全被占满，找不到空房。翻译麦都思确信，这是因为“狡猾的中国当局已有既定方针……要把他们(外商)安置在郊外某个适宜之处，以便严密监视……”。^①

英国代表团似乎被这个限制弄得心烦意乱，这个阻碍上海任何地区发展的决定与在广州实行的对外国人的限制政策大致相同。麦都思的断言是对的，道台就是要将外国人安置在城外，除去监视(这点若在城里更易做到)外，中国的惯例是新来的外国人应和其他在上海的“外来者”同等待遇，而当时所有“外来者”行会都被安置在城外。

巴尔富倚仗军事势力，声称若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就在城隍庙的庭院搭个帐篷。不过，虽然中国官方拒绝帮助外国人找合适的住处，但英国代表团刚刚离开“道台衙门”，就在街上遇到一个友好的商人主动搭话，表示愿为这些外国人提供“一所一流的带家具的宅第”。此人姓姚，广州人，与香港某商人合伙经商。依麦都思看，他希望与广州十三行一道取得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②

巴尔富接受了姚氏的建议，一行人住进了他所说的他那所私宅的楼上。(对这件事，后来有某些争论。)不久，这些轻信的英国人就发现自己成了展品，大批好奇的中国人从有生意头脑的姚氏那里买票观看“‘白鬼子’吃饭、喝水、写字、洗澡、穿衣、睡觉”。领事立刻采取措施中止这种展览。但他发现，在一个依赖中国的仆人和生活必需品的城市里，外国人应付日常生活殊非易事，更重要的是他周围的商人们被中国当局强加给他们的“各种贸易限制和桎梏”所耍弄，用麦都思的话说“一刻也不能忍受了”。此外，他们还需要物资和土地去建造房屋，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

① 麦都思：《上海开埠记》。

② 同上书，第82—83页。

道台所言极是，城内既无可供英商使用的房屋，也不能在“合理条件下保证货栈免遭风险”——正如英国人自己所说的那样。^①

英国人撵走了那些好奇的窥视者和卖参观票的姚氏之后，在那里又住了近两个月。后来这里不够住，巴尔富很容易地又租到了更大的一所房子——尽管官方不允许，但广州商人还是愿意把房子租给有潜力的客户。到了2月，英国人又从一个姓顾的人那里租到了第二处住房，“这个住所叫同顺堂，位于姚家弄……坐北朝南”，院子里有四幢二层楼房，楼上楼下总共52个房间。还有一口井和一个“厕所”。巴尔富交了640两银子押金，每年租金总计834.78美元，外加一小笔土地税（6两银子）。^② 巴尔富为自己在城里选择这处住房辩护说：

本领馆及本领事衙门设于城区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对中国人来说，城里住房的租金也是比较高的，（但）本领事自到任以来，已把在城里设领馆和领事衙门放在了首要地位。

他把受到中国人尊重和与道台及海关监督联系方便作为领事馆留在城里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也承认在城外的商人区会找到一所更为方便、舒适的欧洲式寓所。

巴尔富这个苏格兰炮兵上尉的儿子，14岁就加入了马德拉斯野战队；鸦片战争期间被选为璞鼎查的随员，并因干练地处理中国战争赔款问题而引起了璞鼎查的注意。^③ 他是个单身汉，个人

① FO(外交部档案)228/76，1845年，无日期，巴尔富致戴维斯函。

② FO228/54，1845年9月12日，巴尔富致戴维斯函。

③ P. D. 科茨(P. D. Coates)：《1843—1943中国的英国领事馆和领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5—26页。关于巴尔富，见《英国人物传记辞典·附录》(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Supplement)，第1卷，第114页。

需求极为简单(尽管他一直为他的领事制服着急,但在制服从伦敦运来之前却一直穿军装)。他最关心的是办公处所的条件。他物色的这个地方虽远离欧洲船只被指定使用的深水停泊地,但其优点是靠近道台衙门和海关。这样,巴尔富就有充分的机会与官太道交往。他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相互尊重和合作。

1843年11月14日,到任仅几天的巴尔富领事就宣布上海将于三天后(即当月17日)开埠。他在公告中规定了外国船只的停泊地点及法规。^①

商人通常把船停在水道上,并在停泊地附近的岸上做生意。尽管领事希望他们在城里经商,但诸如“怡和”、“仁记”、“宝顺”这样的商行需要大型建筑物以供居住、经商和贮货之用,四周还要有坚固的围墙。在它们看来,城里的空间根本不够,而且安全问题、入库保税及财产保险等在城里也无法解决。鉴于活动自由和货物保险受限,商人们立刻反对在城里任何地点经商(何况中国人根本不愿接纳他们)。因此,必须在城外为他们找个合适的地方。

据中国官方报道,在11月9日和10日首次官方互访之后,建立会馆和选择一块合适的“荒地”的要求立即被提出,^②因而(可能是当时,也许是稍后),巴尔富与官太道一同察看了那些可以安置商人的地方。最后选中了临近苏州河和黄浦江的汇合处、紧靠已被规定为外国船只停泊处的河区。领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此地划界并制定有关街道、码头及河岸的规划。^③

① 关于停泊范围,领事规定“限于宝山以西至炮台(坐落在黄浦江右岸吴淞口处)西南方向的江面,尽可能在黄浦江左岸靠近吴淞支流的拐弯处装卸货物,这里低于上海围墙约 3/4 英里”。泊船要首尾相接以使航道及吴淞口畅通无阻。不久,这条航道将用浮标标出,标记内的水域归英国人管辖。见FO228/76, 1847年3月23日,阿礼国(Alcock)致戴维思函。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湾版,卷70。

③ 麦都思:《上海开埠记》,第84页。